

梁啟超家書校注本

梁啟超 著

胡躍生 校注

梁啟超家書校注本

梁啟超 著

胡躍生 校注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家书校注本 / 梁启超 著; 胡跃生 校注.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407-8076-0

I. ①梁… II. ①梁… ②胡… III. ①梁启超(1873-1929) — 书信集

IV. ①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1174 号

出版统筹: 吴晓妮

责任编辑: 王红军 古 月

封面设计: 李诗彤

出版人: 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773-2583322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0 号院 邮政编码: 100176)

开本: 880mm×1 230mm 1/32

印张: 28.625 插页: 2 字数: 650 千字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10-67817768)



梁启超 (1873—1929)



梁启超妻子李蕙仙（左1）偕次子思永（左2）、长女思顺（左3）与长子思成（左4）在日本，约摄于1908年。



梁启超二弟梁启勋
(1879—1965)



梁启超与次女思庄、三子思忠摄于日本。

寶貝思順

館在北滄快書堂地方好極了極遠
昨天松坡圖書館成天熱

不知道呢我每夫淺四日任清華三日任城裏入城印任館中
學了一天今天我一箇人獨住在館裏天陰

而我讀了一天的書晚間獨酌了書

小孩子別安著急我並有惡書醉酒亦不忌食吃的
也不讀了我我最愛的孩子讀、最

談什麼呢想不起來了

哦想起來了

你報考希哲在那邊商民愛戴的忙

那令我歡欣了所以我希望一箇人安

梁启超写给长女思顺的家书手迹

校注及编辑出版说明

1. 本书所收家书主要过录自《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与《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部分则辑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及其他文献，出处特别的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

2. 本书将所有存世的梁氏家书共655通，以四个部分加以呈现，按不同写作对象第一封信的起始时间先后排序，即分为“与妻书”“与弟书”“与儿女书”“与父书”。并附录一封“与婿书”煞尾。

3. 由于部分梁启超家书无手迹作为校勘依据，只能从《梁启超年谱长编》中直接采录，并参阅《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考虑到前者出版较早，所保存书信未经删减。因此，凡无手迹可依傍的家书文本，辑录时以前者为主，后者作为参考。文字两相参证，务求准确合理。

4. 本书主要以《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及《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家书手迹作为校勘依据，力所能及地保留并还原梁启超家书的文字原貌。由于采用简体字排印，繁体字、绝大多数异体

字、古字，都规范为简化字；为了保留梁启超所处时代汉语汉字的使用特征，多数通假字基本不改动，尽量维持原貌，并在注释中加以说明；繁难字一般会在注释中简单释义并加注汉语拼音。因某些汉字归并后便失去原字实际运用特征，如旧式文书“迳启者”，若写成“径启者”则显得荒谬，因现代文书已经不再使用这种称谓。因此，一仍其旧，保持与手迹对应，未予归并。

5. 梁启超所处时代正值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期，有些字词的运用，在现代汉语运用规范中已经发生了变化，如表程度的副词“狠”，现在用“很”；动词玩耍的“顽”，现在用“玩”；动词托付的“託”，现在用“托”等。由于这类词在梁氏家书中使用频次极高，读者联系上下文，一望而知其意，并不影响理解，为保留时代用字特征，也一仍其旧，不作改动。

6. 凡人物姓名字号，如果遇有属于归并的繁体字，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应保留原字不变。如陆徵祥的“徵”不用“征”、罗文幹的“幹”不用“干”等。

7. 凡《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与《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所载家书中的错字、衍字、脱字均在注释中存疑或纠正，不直接改动原文。至于同一家书同一处文字，因版本不同而有差异，但又没有手迹可资稽核查证，无论采用何种版本，都以注释说明之。

8. 有些家书会出现一封多通的情况，即一信写完还未封口投递，又补写一信，再同时寄出，凡遇这种情况一般都视为一封信，接排在一起，统一注释。

9. 绝大多数家书没有句读，没有段落划分——或者有，也属于大而化之。本书重新进行标点，并根据文意划分段落。但极少数家书，梁启超不仅划分段落，而且使用标点符号，凡遇这种情

况，完全保留书信的原貌，基本不作改动，并在注释中说明。

10. 已经刊行的梁启超家书写作时间比较混乱，有的使用农历，有的使用公历，在保留家书落款时间不变的前提下，本书尽可能统一使用公历。对写作时间不详的家书，尽量考证还原出具体写作时间，并按照写作时间先后排序。

11. 梁启超在写作家书时往往有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写作过程中，发现有内容要适当解释或补充，以边文的形式用小字加写一旁，凡遇这种情况，本书即以括号将边文加在句末或相应位置；又一种是梁启超在书写过程中有意于行内留空，再以小字分两行书写于空内作为补文，遇这种情况，本书即以破折号连接补写的小字，表示破折号之后是前文的说明性文字。至于信末或其他空白处的附言，一般按原貌或排在祝词与落款之间，或排在信末，通常视家书手迹原貌而定。

12. 由于家书中与儿女书行世较早，与弟书则迟至2012年才刊行，校注工作也是按这样的先后顺序展开的。但本次结集出版考虑到与弟书写作的起始时间早于与儿女书，因此自然将与弟书排在与儿女书之前，这样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少数人物可能不是在首次出现时注释，而是后来才注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书采用注释互见的形式，即使有关人物的注文没有在首次出现，但一定有相应的注引指示，即“见与某书某号注”；采用互见指引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即使是同一人，往往也会出现不同的称谓，如梁启超的挚友汤觉顿，在家书中先后有“荷丈”“觉顿”“荷庵”“荷公”等种种称谓。因此，互见指引比单纯的首次出现注释更加利于阅读。

13. 梁氏家书在内容上具有纵向的关联，如“与儿女书”就梁思永是否在留美毕业之前回国参与考古实习一事，在不同家书

里反复讨论；同时也有横向的关联，如筑墓营葬梁妻李蕙仙这件事，在“与儿女书”和“与弟书”中均有多次商议。为了突出内容横向与纵向的关联度，尤其是利于读者前后查考，分别对“与妻书”“与弟书”“与儿女书”“与父书”等进行编号，如内容相关，需要互见时，往往会在相应注释中指出“见与某书某号”，以利于检索引领。

14. 家书的行款格式，在保留原书信写作的前提下，均按一般的手札规范，如抬头顶格，祝辞施者退格，受者顶格等一般规范。考虑到横排规范与现代读者阅读习惯，唯旧时书札遇尊长与同辈“空格示敬”的书写格式未加保留。但某些特殊情况，如“与弟书”中的订婚祭告文等即完全保留梁启超写定的格式，仅将竖排改为横排。

15. 本书对人物、事件、名物、繁难字以及家书的某些特征等，均加以注释，注文撰写参阅了大量的书籍与文献，凡需要特别说明出处的均在注文中加以说明。多数人物的注释采用综述式说明文字，一般不一一注明出处。

16. 本书借鉴《梁启超年谱长编》及2016年新近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梁启超家书、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的编辑指导思想与原则，个别书信对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所指摘，为了全面如实反映梁启超的思想活动，本书收录时均保留原貌。

饮冰卅年 热肠如初

(代序)

1

至今存世的六百余通梁启超家书，第一封写于1898年10月29日，最后一封写于1928年10月17日，起讫划一，前后正好30年。

这30年与梁启超社会生涯后三段完整对应，即除第一阶段（1890—1898）维新运动时期外，全面覆盖第二阶段（1898—1912）流亡传播时期、第三阶段（1912—1920）从政议政时期、第四阶段（1920—1928）文化活动时期。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辞世，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先此半年，宣告结束。时间上梁启超家书刚好与戊戌变法结束后的晚清时期，及中华民国前半段——北京政府时期相始终。这些时间与事件的对应重叠并非纯属巧合，冥冥之中，对于历史人物梁启超而言有深意存焉。

晚清以降，在新旧列强直接和间接侵夺下，外敌大举入侵之前，近现代中国被两股巨大的社会势力所煎迫：顽固的守旧势力与激进的革命势力相互颞颥缠斗，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冲突

和乱源。清室覆亡，共和肇造，温和政治势力一度成为两极争取的政治盟友，但终因道路不同，不能左右逢源，生存空间日渐狭促。丛林法则横行之下，温和政治势力渐次失据，几欲不能自存。作为温和政治势力的灵魂级人物终于被逼到墙角，这就是梁启超的宿命。北伐成功，梁启超一瞑而逝，温和政治休止。

面对日趋暗淡的格局，梁启超依然没有放弃，而是倾情投入，靖献了自己的生命与能量，不顾疾病缠身仍一如既往燃烧自己，试图点亮社会，直至灯残油尽。综览梁氏家书，前衔晚清后接民国，三十年来，梁启超心灵、思想、情感、心理、感觉以及社会活动的庞杂、家庭生活的细琐，点点滴滴，巨细靡遗，尽在其中。仅家书牵涉出的晚清民初各类人物，有名有姓者达百人以上。三十年的时代脉络、政治风云、思想潮流、文化走向、社会风尚、语言流变……俱在笔底。姑以三十年中重大历史事件为证：戊戌政变、保皇运动、辛丑拳乱、立宪运动、武昌起义、滦州兵变、南北议和、民国肇造、蒙疆分裂、民初党争、宋教仁案、二次革命、二十一条、洪宪帝制、护国运动、府院之争、一次大战、巴黎和会、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直皖互斗、直奉争利、五卅运动、国际共运、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无一不囊括其中。可以说，《梁启超家书》堪比半部晚清史与半部民国史。

在这段纷扰的历史岁月里，梁启超屡屡在家书中发出“奈何！奈何！”的叹息，不时流露出欲弃绝政治活动“理我荒秽”的情怀，然而出于一副与生俱来的热肠，即使在备受疾病困扰的晚期，梁启超依然深切关注社会的走向，在收入锐减甚至断绝的情况下，他依然资助伍庄的温和政治活动，并在家书中以命令式口吻吩咐梁启勋：“前属拨五百元与宪广，想未交去，闻渠将行，即交为希。”他坚持不懈呼号理性处理社会危机与政治冲突，利

用媒体与讲坛传播温和的政治主张。有一个与家书相关的细节特别值得一提：梁启超曾两次将1925年所作的《浣溪沙·端午后一日夜坐》录入家书，以冰雪般的冷峻倾诉满腔热忱。词作最后一句“不因无益费相思”，套用自李商隐“直道相思了无益”。经梁启超的妙手点化，一改原句贫薄，注入丰富内蕴。就像复调音乐两组相互交织的乐句：一组旋律诉说作者与太平洋彼岸儿女们深长的思念之情，另一组呈现作者对家国天下的关切之心，更宣示了不以成败为转移的政治伦理与操守。其实后一层才是复调的主旋律。梁启超在写入家书后，第一次先故意向孩子们发问，留下伏笔：“词中的寄托，你们看得出来不？”一个月后再次将同一词抄入家书，并夫子自道：“看这首词，可以略知我心事了。”说到底，梁启超立于天地间，凭借的就是这副热肠与坚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坚持走完57个春秋的人生路。

2

家书是梁启超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梁氏所有著作中的又一个高光点，虽然在梁启超巨型体量的著作里，家书所占比例十分有限，但价值独特，非其他著作可比拟替代。以对梁学影响巨大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为例，所收录的家书约占全书总量五分之一，分量举足轻重。丁文江当年接手年谱编写时，便以科学家的实证精神提出年谱编写原则，应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批量采摘梁启超社交书与家书。由于梁氏家书的诸多价值已经远远溢出其本身的文献价值，无论是研究者还是一般读者，使用梁氏家书的概率非常之高。在出版界与读书界，梁氏家书影响力，可谓无人不知。尤其是近十余年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梁启超家书反复被多家出版社刊印。从2000年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梁启超家书》

算起，至今已有近十种《梁启超家书》版本。与热闹的出版现状不对称的是，学界与出版界显然忽视了梁氏家书的版本基础工作，称得上校勘精准、编辑周备的梁氏家书版本至今未见。追根溯源，或许与梁氏家书的出版源头有关。现在行世的梁氏家书似应来自于1936年完成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以及由此陆续衍生出的台北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梁启超年谱长编》及中华书局《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若将后两种年谱加以比较，不难发现许多编校错误一模一样，二者版本血统相同不言而喻。其实，先于两种年谱，中华书局于1994年即已推出《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全二册），对梁氏家书进行精编精校的必要条件已经具备。虽然新千年中国文联出版社《梁启超家书》对年谱与《手迹》兼收并蓄，有开创之功，但基本是个粗率的毛坯。直到2012年才出现再次根据《手迹》校勘的梁启超家书版本，由于《手迹》草书的辨识难度与绕不开的庞大工作量，精编精校殊为不易，迄今为止，各种版本的《梁启超家书》（含两种年谱中的家书）都存在大量校勘问题，差错之密集依然惊人。

2012年梁启超最亲近的二弟梁启勋的后人将一批被称为“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的文献委托匡时国际公开拍卖，其中有梁启超写给梁启勋的家书两百多通，这批家书的重现与回归极大地丰富了梁氏家书的内容。同时也带来太多的校勘问题和若干难以厘清的头绪。

据夏晓虹所言，拍卖前“致梁启勋书”原本装订成册，而且衬纸的天头地脚标注了少量的纪年——写作日期。如一封落款为十月八日的手札旁批注了“十七年/十月八日/最后”，意即该信为写给梁启勋的最后一信。但《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成书后，

在此信之后又放入另一信，写作时间为“1928年10月25日”，比10月8日那封“最后一书”又晚了半个月。到底有几个最后？真是煞费猜想。这种情况在《档案》中批量存在，许多家书仅有笼统的年份，部分家书即使有具体写作年月日，也并不可靠，完全经不起认真推敲。部分家书前后颠倒，编序混乱，纰缪迭出，一些错置的书信前后反差竟达数年之久，可谓问题严重。不少家书的写作时间需要反复研判、重新确定。以放入1916年的一封钢笔书写的短札为例，其真实写作时间应为1919年6月9日，因为该信牵涉到一封十分重要的长函，这封信曾公开发表在1919年的《晨报》上，集中介绍梁启超一行在欧洲的考察访问活动，尤其是巴黎和会期间一些非官方的外交活动。梁启勋绝不可能把这封特别的短札归入1916年。

至于梁氏家书中“与儿女书”部分，经过一些出版社的打磨，文字编校质量明显提升。前文提及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梁启超全集》阶段性成果中的《梁启超家书》即是代表——虽然还有许多讹误未被剔除，不少错置书信仍待纠正。此外，尚有少量漏辑的家书以及辑入后没能准确编入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至于“与弟书”则有太多的校正勘误空间，无论是手迹草书辨识、篇章句读、写作时间判定与正确还原等，需要辨谬纠错、稽考订正的工作尚多。为此，本书试图在校勘注释等方面补苴罅漏，有所作为，这也是不揣冒昧，僭称本书为《梁启超家书校注本》的初衷。

为此，本书确定了一些条条框框，作为努力方向，姑以四言表达如下：

校勘从精，还原必真；辑录求全，搜罗务尽；考订有据，稽核多方；注释宜详，拓展畛域；编辑创新，查阅便利；体例周

备，差可效颦。

但个人不比团队，若稍有所成，也必定有限。

3

梁启超是一位政治能量巨大的人物，所不同的是并非来自于枪炮、金钱、强大组织或列强支持——虽然他也一度惶惑，曾试图去寻找这类能量。他的政治能量，其来有自——他的思想、悲悯的情怀、洞悉未来的远见卓识，他那充满智慧与激情澎湃的文字、有持守的政治伦理与活动、丰硕的学术成果、热情洋溢的人格魅力。与其说他是政治伟人，毋宁说他是文化巨人。即使以家人为对象的家书，也时刻闪现着只有巨人才拥有的襟怀与境界。综观梁启超的政治活动、社会实践与学术文化教育生涯，济世改良、求真穷理、精神至上才是他的终极关怀。对家人对社会，梁启超总觉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天降大任的使命感始终溢满家书的字里行间，热切的精神力量贯穿三十年而未曾稍减。

读其书，想见其为人，难免被血性的热肠所打动；既然以图书编辑专业立身，对于璞玉般的书稿，自然会生出凿璞石而取美玉的冲动。基于双重缘由，如果说我兜揽了一项力有不逮的责任，那也是受到了“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的感染与感召。唯愿所作所为能对未来《梁启超全集》家书部分的编辑工作有些许参考，能为读者提供点滴帮助。校注虽劳，却也自得其乐，如果还能效涓埃于社会，就算锦上添花了。

校注者谨识

2016年10月2日于广州番禺华南新城寓所